

## ○第一章

### 现实的中国国情

“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

马克思(K. Marx)说得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①</sup>。同样,中国的现代化伟业,也只有依靠勤劳智慧的中国人自己来创造;当然,这种创造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人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即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家底”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并贯彻符合中国“国情”和“家底”的实现现代化的方针、政策、措施。这既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要求。

为了脚踏实地地搞好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就得弄清我们的“国情”盘实我们的“家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603页。

## 第一节 人口多 资源少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向外国友人历数中国的家珍时曾风趣地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还有一部《红楼梦》”。把《红楼梦》一书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相提并论，这样的评价是否妥当，这个问题在此暂且搁置不论；前面的八个字即“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长期以来的确成了众口一词、妇孺皆知的对我国国情的概括。

说我国“人口众多”，一点儿也不假。全国人口总数 1953 年为 6 亿，1964 年为 7 亿，1969 年为 8 亿，1974 年为 9 亿，1982 年为 10 亿，1989 年为 11 亿，1995 年 2 月 15 日达到 12 亿，一直居世界各国之首。

说我国“地大物博”则既对也不对。

从绝对量即总量上来分析，我国国土面积 960 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位居世界第 3 位；耕地面积、林地面积、草地面积和淡水拥有量等主要可更新资源指标分别居世界第 4、第 6、第 3 和第 4 位；大多数种类的不可更新资源的拥有量也都名列各国的前茅。如 1996 年我国生产的一次性能源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水电（不包括农家用的薪柴、沼气、风力等

新中国成立后，共进行了四次国土面积测量工作。1956 年进行首次测量工作，量算出国土面积 959 万平方公里，习惯地称为 960 万平方公里；1962 年量算为 951 万平方公里；1963 年量算为 953 万平方公里；1984 年第四次测量得到的结果为 1045 万平方公里。目前仍沿用 960 万平方公里的说法。

类能源折合标准煤 12.6 亿吨，居世界前列<sup>①</sup>。根据地矿部门在 1997 年 4 月 22 日第 27 个“世界地球日”宣传活动中提供的数据，我国目前已发现的矿种达 162 种，有 148 种探明了储量，其中煤、钒、钛、铅、锌等 25 种重要矿种的探明储量居世界前列。在探明的矿产储量中，通过对 45 种矿产的潜在价值进行计算，并且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其潜在价值仅次于苏联和美国，居世界第 3 位；已有 150 多种矿产被开发利用，矿产总开采量达 69 亿吨，跃居世界三大矿业国之一<sup>②</sup>。如此看来，我国的确“地大物博”。

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因而从相对量即人均占有量上分析，我国的资源就显得非常匮乏，“地”既不“大”，“物”也不“博”。我国国土资源、耕地资源、林地资源、草地资源、淡水资源等可更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居世界第 120 位，是 7 个资源大国中资源人均占有量最低的国家。这 7 个资源大国中的另 6 个国家人均占有资源量的排序为：澳大利亚（第 3 位）、加拿大（第 5 位）、巴西（第 15 位）、苏联（第 20 位）、美国（第 27 位）、印度（第 110 位）<sup>③</sup>。我国人均国土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1/3；人均每年消耗的能源折合标准煤为 1.14 吨，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人均拥有的矿产资源量看，我国名列世界第 80 位，是一个资源相对不足的“小国”。从现有的资源情况看，我国现在

转引自李鹏撰：《中国的能源政策》，载于《求是》杂志 1997 年第 11 期。

参见 1997 年 4 月 23 日《中国资产新闻》报边艳菊文。

参见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编著：《开源与节约——中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潜力与对策》，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6 页。

转引自李鹏撰：《中国的能源政策》，载于《求是》杂志 1997 年第 11 期。

大约有 1/4 的资源紧张，到 2000 年有一半矿产资源紧张，到 2020 年可以保证需求的仅有 6 种 占 13% 将出现矿产资源全面紧张的严重局面。

现在对我国的‘地’和若干主要的‘物’的人均占有量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如下：

资源名称	我国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资源名称	我国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国土	32	铁矿(探明储量)	48
耕地	32	铜(探明储量)	29
林地	13	铝(工业储量)	33
草原	33	钨(工业储量)	225
可开垦农业用地	31	锡(探明储量)	70
森林积蓄量	13	稀土(工业储量)	338
淡水	24	钛(探明储量)	100
煤(地质储量)	47	镍(探明储量)	25
其中可开发量	40	铅(探明储量)	54
石油(地质储量)	32~64	锌(探明储量)	100
水能(总储量)	61	硫(探明储量)	85
其中可开发量	81	磷(探明储量)	52

由此可见，我国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除了钨、稀土、钛、锌等少数几个品种高于或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外，其他品种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相当多的资源如林地、森林、淡水等还

参 见 1997 年 4 月 23 日《中国资产新闻》报 边艳菊文。

资料来源：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载于《未来与发展》杂志 1989 年第 5 期、第 6 期。

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1/4；许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制约作用的资源如耕地、草原和煤炭、石油等能源以及铁、铜、铝、镍等金属资源，也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1/2。可以预测，未来我国资源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将会日益严峻。因为，随着人口持续增长、经济不断发展、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人均资源消费量必然迅速增长，人均资源拥有量将进一步下降；其中相当一部分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只会越用越少。所以，我国潜伏着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危险。现在我国正处于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若干主要农产品、矿产品以及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量还不得不大幅度增长，势必要以最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状况来承载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数量和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方能逐步实现现代化。

目前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最严重的资源问题，当数耕地和淡水的奇缺。

先看耕地。以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22% 的人口 这既是我国人民创造的一项惊人奇迹，也是中华民族背负的一个沉重包袱。我们曾有过人均拥有众多耕地的历史，遗憾的是这已一去不再复返。下表给出了我国历代耕地面积的变化情况：

朝代	历史纪年	公元纪年	人口数(人)	耕地数(亩)	户均耕地(亩)	人均耕地(亩)
西汉	平帝元始二年	2	59 594 978	827 053 600	67.61	13.88
东汉	安帝延光四年	125	48 690 789	694 289 213	79.25	??13.70
唐	天宝十四年	755	52 917 309	1 430 386 213	160.46	27.03
宋	天禧五年	1021	19 930 220	524 758 432	60.47	26.33
明	太祖洪武十四年	1381	59 873 306	366 771 549	34.42	6.13

资料来源：《中国国情国力》，转引自 1993 年 12 月 16 日（扬子晚报）。

续表

朝代	历史纪年	公元纪年	人口数(人)	耕地数(亩)	户均耕地(亩)	人均耕地(亩)
明	神宗万历三十年	1602	56 305 050	1 161 894 800		20.64
清	康熙十九年	1680		522 766 687		30.58
清	雍正十二年	1734	? 27 355 462	890 138 724		32.54
清	乾隆十八年	1753	102 750 000	708 114 288		6.89
清	乾隆三十一年	1766	208 095 796	741 449 550		3.56
清	光绪十三年	1887	377 636 000	911 976 606		2.41
		1949	540 000 000	1 468 000 000		2.70
		1987	1 080 000 000	1 438 000 000		1.33
		1993	1 145 000 000			1.30

( ?此处似有误。??此处似应为 14.26 亩。亩：每亩约为 667 平方米。——引者注)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在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 1.3 亩，不足世界水平（人均 4.8 亩）的 1/3，而且我国耕地总量以及人均占有量减少的趋势仍然十分明显。现在我国每年大约增加 1500 万~1700 万新生人口，同时也大约减少 1500 万亩~1700 万亩耕地。盖工厂需要占用耕地，修公路也需要占用耕地，建住宅还是需要占用耕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耕地已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再看淡水资源。中国水资源总量为 28 000 亿立方米（其中地下水 8000 亿立方米）居世界第 4 位；然而，人均淡水量仅 2340 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淡水量的 1/4，居世界第 88 位，已被列入世界 12 个贫水国家的名单中。目前我国农业受旱面积 2 亿亩~3 亿亩，640 多个城市中，300 多个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达 108 个，全国城市年缺水量为 70 多亿立方米，平均每天缺水 2000 万吨，每年影响工业产值数百亿元。在联合国

召开的水资源会议上，一批科学家大声疾呼到了 21 世纪缺水将成为中国的社会性危机。严重缺水已造成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断流，而且断流的起始日期逐年提前，断流的持续时间逐年拉长。1995 年黄河下游断流始发于 3 月 4 日，1997 年提前到 2 月 7 日。1995 年 7 月 14 日黄河断流河段最大长度达 622 公里，一直到 7 月 24 日黄河才全部恢复过流。仅 1972 年～1996 年，黄河下游因断流和供水不足，造成工农业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 268 亿元。一方面淡水资源奇缺，另一方面淡水资源的浪费又很惊人。当前大部分地区农业的灌溉方式非常原始，渠道网络设施简陋，水的渗、漏、漫等流失现象严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 15% 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要高达 50%～70%。

还要看到我国许多资源不仅人均占有量少而且分布得很不合理。1933 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在黑龙江省爱辉县和云南省腾冲县之间作了一条连线，把全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部分，结果发现在占全国总面积 42.9% 的东南部地区集中了全国 96% 的人口，而占全国总面积 57.1% 的西北部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4%。半个世纪后，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全国总人口中分布在东南部地区的占 94.4%，分布在西北部地区的仅占 5.6%，50 年中西北部地区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只改变了 1.6 个百分点。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 80 年代初对胡焕庸教授的“爱辉—腾冲”线略作修改他在黑龙江省漠河县和云南省瑞丽县之间也作了一条连线，即“漠河—瑞丽”线，把全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面积基本相等的部分，结果发现东南部集中了全国 96% 的人口，西北部只有占全国 4% 的人口。资源的分布则与人口的分布极不相适应。我国矿产资源绝大部分分布在人口稀少、经济薄弱的西北部地区，即上述“爱辉—腾冲”线或“漠河—瑞丽”线的西北部而人口稠密、经济

发达的东南部地区 即上述“爱辉—腾冲”线或“漠河—瑞丽”线的东南部，却很少有矿产资源。这就给资源的顺利开发、生产的合理布局和经济协调发展带来较大的困难，而且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来加以解决。特别是在淡水资源方面，其空间、时间和形态的分布都很不平衡：从空间上看，大致是东南多、西北少 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从时间上看 全年 60% 以上的雨水集中在夏秋的 3~4 个月之间，且多以暴雨的形式倾盆而下；从形态上看 约有 70% 的地下水分布在地表水比较丰富的南方，而在地表水非常短缺的北方，地下水资源也严重贫乏。这就造成有的地方严重干旱，有的地方则洪涝成灾。如果把能源、矿产资源同淡水资源结合起来看，它们的分布也极不合理。淡水资源丰富的南方因为缺乏能源和矿产，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而北方由于缺乏淡水资源，其能源、矿产丰富的优势也难以有效地发挥。面对这种状况 我国不得不耗费巨资 进行“南水北调”和“北煤南运”。

显然 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相对量上来分析，“地大物博”总是好事，“地小物稀”总是坏事。然而 对于“人口众多”的评价，人们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早在 1789 年，英国的马尔萨斯（T.R.Malthus）就曾经断言：粮食生产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则按几何级数增长，因而粮食的增长永远也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人多是绝对的坏事情。可是到了 1949 年 中国的毛泽东则宣告：“世间一切事物中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 这办法就是生产。”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 第 1516 页、第 1515 页。

其实，不应当抽象地谈论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人有一双手，可以创造物质财富；也有一张口，需要消费物质财富。俗话说：“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可是“人手”和“人口”的统一，社会既要生产（“种田”），也要消费（“过年”），因此人口过多或过少，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不利，只有人口适量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下的中国，长期处于社会动荡、经济停滞之中，人口再生产一直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大抵相当，因而自然增长率很低，人口数量基本稳定、略有增长。碰上较大的战乱和灾荒，人口还呈萎缩状态。中国人口过多问题的隐患早在 18 世纪就开始潜伏下来了。

进入 18 世纪，中国人口刚突破 1 亿大关。1712 年，清朝康熙皇帝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1723 年，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的政策，把秦汉以来一直实行的“人头税”改为“田亩税”<sup>①</sup>。在清朝政府奉行人口增殖政策的同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家庭生产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体系也有力地刺激着人口增长。因为，这时生产的增加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劳动力培育费用很低和孩子很早就开始为家庭劳动，都促使农民趋向于早育和多育。这百余年国家统一，天下太平，没有出现频繁的战乱和太大的灾荒，也给人口的增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据史料记载，1762 年我国人口超过 2 亿，1790 年超过 3 亿，1834 年超过 4 亿。远在欧洲的马克思和恩格斯（F. Engels）已经注意到中国的人口问题，指出中国人口过剩

<sup>①</sup> 转引自何博传著：《山坳上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22 页。

“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sup>①</sup>。

当然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中国外患不断，内乱不已，经济停滞不前，人民流离失所，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口增长的势头。根据史料记载，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19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全国人口共减少了 1 亿多，几乎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 1/3。民国期间（1912 年～1949 年），全国人口总数始终在 4.5 亿左右波动。1840 年～1949 年间，我国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仅为 2.6‰<sup>②</sup>。

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死亡率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幅度的下降，人口的增长也随之进入了“快车道”。当时的人口理论、政府政策和社会措施都在鼓励生育：在人口理论上，误认为人多绝对是绝对的好事，以为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在政府政策上，严格限制人工流产，禁止绝育；在社会措施上，当时城市住房和农村合作化后的自留地均按人口数量分配，人多多分，人少少得，国家和集体对由于家庭人口多所造成的生活困难一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64 页。

转引自刘铮主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95 页。

③ 1936 年我国人口死亡率为 27.1‰，1957 年降为 10.8‰，20 年间下降幅度高达 60%。以后人口死亡率又持续下降：70 年代中期，全国人口总死亡率为 7.3‰，其中城市为 5.4‰，农村为 7.9‰，农村是城市的约 1.5 倍；80 年代后期，全国人口总死亡率为 6.5‰，其中城市为 5.8‰，农村为 6.7‰，两者差距在明显缩小。70 年代中后期以后，城市人口死亡率之所以上升，是由于受到年龄结构老化的影响，这也反映了城市人口死亡率已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

给予补助，并且还错误地批判了提出节制人口生产主张的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结果，1963年出现了我国解放后最高的人口出生率（43.4‰）和最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33.3‰）<sup>①</sup>，1962年～1975年的14年间全国共出生3.5亿个孩子。到了70年代初，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已越来越突出，人们再也不能置严峻的人口问题于不顾，就连一贯提倡人多是好事的毛泽东主席也发出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指示。从此，旨在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得到了越来越认真而切实的贯彻执行。

即使如此，时已晚矣！现在，中国人口数要比整个欧洲加上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总人口数还要多。就是说，中国人口数要远远多于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数的总和。有人说，中国当前面临的一切社会问题、其根源都在于人口太多；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也在于人口太多。这一说法尽管不全面、不贴切，却相当深刻。我国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背负人口过多的包袱，深受其害。

首先，人口太多产生了巨大的生态压力和资源匮乏，导致过度的开荒、耕作、捕捞、放牧和环境的破坏。人多吃粮多，房屋宅地需求量也大，原有的耕地不仅不够用甚至还在不断减少，只好拼命开荒种地、围湖造田、毁林种粮，从而造成水土流失、洪涝不断、生态平衡被打破。人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也大，矿产的开采量年年递增，林木的砍伐量远远超过种植量，畜产品和水产品更是遭到了人类的洗劫，肉类、皮革、鱼、虾、蟹、鳖乃至广东、海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

转引自《人口研究》杂志1984年第5期，第5页。

南等地‘生猛海鲜’的价格惊人且与日俱增 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由人口太多引起的生态压力和资源匮乏转化为经济压力 如产量低、效益差、失业、贫穷、通货膨胀、财政困难等等。这里特别突出的是以下两个“两难选择”：一是在投资方面 我国目前的收入总量和投资总量都有限。为了让众多的人口生存下去并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用大笔资金作为眼前的消费投资；为了今后的技术进步和提高未来生活水平，就必须拿出比发达国家更多的资金来发展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重消费投资，轻人力资本投资，国家今后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就会受影响；轻消费投资，重人力资本投资，就会让现在的人们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如果两个投资都重，则只能靠借取外债或多发货币，从而造成通货膨胀、债台高筑。二是在就业方面，众多的人口已经使得我国的就业困难很大，除了一部分人无事可做、在家待业或离业下岗以外，还有更多的人则在职失业。这种在职失业，从表面上看人人都有一份工作，实际上是几个人在分担着一个人就足以完成的工作。为了使更多的人就业，就要把技术保持在手工的或半机械化的水平上，那么国家将会变得更为落后；如果要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就要发展高新技术，那么就会把更多的人赶到失业者的队伍中去。这些年来，我国在教育的发展和高新技术的发展方面，屡屡徘徊观望，决策犹豫不定，其根源就在于此。

再次，由人口太多导致的上述经济压力又转化为社会压力，如饥饿、贫困、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低、道德败坏、管理混乱等等。特别是我国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大中城市，给城市带来沉重的负担 交通堵塞 住房紧张 犯罪率不断上升 这就使得城市这个原本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变得混乱 甚至会失去控制，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我国长期以来在城市化问题上也面

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为了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就应当大力发展大中城市并充分发挥它们的中心作用，鼓励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可是由于人口太多，如果农村人口不加控制地到处乱流，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又不得不加强户籍管理，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的流动；可是，这又阻滞了城市的发展及其中心作用的发挥，放慢了城市化的步伐，从而也减缓了现代化的进程。这种左右为难的境地，显然源于人口规模过于庞大。

还要看到，由人口太多引起的上述生态压力、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还可能转化为政治压力，甚至引起骚乱和战争。目前我国的问题尚未严重到这个地步，但已初露端倪，千万不可大意，比如因人多争水争地而发生的地区性“械斗”事件，失业人员向政府请愿施压，都是突出的例子。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 Acheson)曾把中国爆发革命归因于人口太多、对土地的压力太大。我国历史学家罗尔纲也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由“人口压迫”引起的。这些说法当然有“无视阶级矛盾”“抹杀剥削制度”的片面性，但也含有合理内核。如果说骚乱和战争（包括革命战争在内）并不都是由于人口太多，那么，人口多到超越了某个极限却一定会导致骚乱或战争。

人口过多或过少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口数量应当适度。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同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必须协调发展的观点，就认为同物质资料生产

据史料记载，1851年清王朝人口达到其历史最高点4.31亿，社会矛盾也激化到顶点，同年即爆发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后加上北方的捻军起义和西北的回民起义，前后延续了近20年到1867年全国总人口剧减到2.55亿才缓解了“人地矛盾”。

状况相适应的人口规模才是适度的人口规模。关于适度人口规模的计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在后面将专门论述，这里仅介绍几种计算结果。根据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我国的理想人口数应为 7 亿到 10 亿。因为从淡水供应看，我国人口不宜超过 4.5 亿人；从能源生产看，我国能源的理想负载能力是 11.5 亿人；从动物蛋白质供应看，我国人口不宜超过 2.6 亿人；从粮食产量角度看，我国人口不宜超过 12.6 亿人；从土地资源看，我国人口不宜超过 10 亿人；从人口老化程度和人口状况看，我国人口不宜超过 5 亿人。我国学者宋健等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计算出中国适度人口规模约在 7 亿人左右。由此看来，我国现有的人口确实太多了，人多是我国最大的难题。

## 第二节 底子薄 基础差

毛泽东曾用“一穷二白”<sup>③</sup>来形容我国的经济贫穷、文化落后。邓小平则用“底子薄”<sup>④</sup>来说明同样的情况。这又是我国一大重要的现实国情。

根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载：“在 1937 年中日战争开始前，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现代以前的。在 20 世纪 30 年代，年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排名表上接近最低层，每人约 58 元人民

转引自 1997 年 6 月 21 日《华商时报》杨培珂文。

参见侯文若著：《西方人口学理论述评》，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8~116 页。

③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519 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3 页。

币或 15 美元 (1933 年价格) .....经济的前现代特点被产品的结构和劳动力的分配所证实。几乎有 2/3 的产品来自农业, 工业产品不足 1/5。此外, 由于绝大部分工业产品由传统的手工业方法生产, 而且绝大部分服务行业也是传统的, 所以用现代手段生产的产品总量不到 10%。与此相似的是, 90% 以上的劳动力依靠传统技术。”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也证实了这一点。1948 年 9 月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他曾插话说: “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 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 10%~20%。”<sup>②</sup> 在 1954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0 次会议上, 他又形象地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 能造茶碗茶壶, 能种粮食, 还能磨成面粉, 还能造纸。但是, 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经过新中国四十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近 20 年的奋斗, 我国的状况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描述的 30 年代时的情况已大相径庭, 同毛泽东在 40 年代、50 年代的评价也相去甚远。但是, “底子薄、基础差”的面貌不仅仍然存在, 而且严重地制约着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先看经济方面的情况。

在农业生产上, 基本是以手工劳动为主, 在某些边远的偏僻

① 参见 [美] R. 麦克拉夸尔、费正清编: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65)》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50~151 页。

② 转引自薄一波著: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47~48 页。

③ 转引自薄一波著: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92 页。

山区，农业生产近似于刀耕火种。1949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只有69公斤，棉花亩产10.7公斤，油料亩产40.5公斤，根本不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在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和电气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比如1978年我国平均每万公顷耕地分摊到的拖拉机只有56台，而美国达到235台，日本达到1800多台；我国每公顷耕地平均化肥消费量为89公斤，美国为103公斤，日本为473公斤；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粮食产量为1040公斤，美国为95352公斤，日本为2316公斤。即使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平均每万公顷耕地分摊到的拖拉机也只有97台（1995年），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生产的粮食也只有1372公斤（1993年）<sup>③</sup>。尽管有某些不可比因素，但我国同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率和技术装备条件方面的高低悬殊是显而易见的。直到现在，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始终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最薄弱的环节，12亿人口中有8亿多人在农村。要把大量的多余农业人口转到工业方面来，要逐步实现农村工业化、乡村都市化，对中国来说是更加艰巨、更加长期的任务。

还要看到，尽管我国地域广阔，但可用于农林牧业的土地只占国土总面积的46%，耕地面积仅占国土总面积的11.5%，后备的土地资源也很不足，高寒地区、戈壁沙漠等不易被利用的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36.3%。人多地少、农业发展潜力不大，将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转引自孙伯揆、董星、严强编著：《在反思和探索中前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1996）》，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版。

是我国长期面临的十分突出的问题。

旧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技术基础非常薄弱。从清朝末年办“洋务”到 1949 年全国仅积累起 100 多亿元的固定资产，主要工业品产量少得可怜：纱 32.7 万吨，平均每人 0.6 公斤，原煤 3200 万吨，平均每人 59 公斤，发电量 43 亿度，平均每人 7.9 度，钢 15.8 万吨，平均每人 0.29 公斤。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极端落后，原始的采掘业和敲敲打打、修修补补等工场手工业占 40% 以上。1949 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占世界的位次为：粮食第 2 棉花第 4 原煤第 9 钢第 26 原油第 27 发电量第 25<sup>②</sup>。

如果说 1949 年中国还处于战时，以上数据不足以反映实际的经济实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我国全面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前的 1952 年的有关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这一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如下：

产品品名	总产量	人均占有量
粮食	16 392 万吨	287.58 公斤
棉花	130.4 万吨	2.29 公斤
煤	6660 万吨	115.79 公斤
原油	44 万吨	0.77 公斤
发电量	73 亿度	12.80 度
钢	135 万吨	2.37 公斤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28 页。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统计图表插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总产量”资料来源同上书统计图表插页。“人均占有量”根据当时的人口总数 5.7 亿进行计算后得出。